本版编辑：李步前 版式设计：张 慧 E-mail:f4@studytimes.cn Tel:010-68922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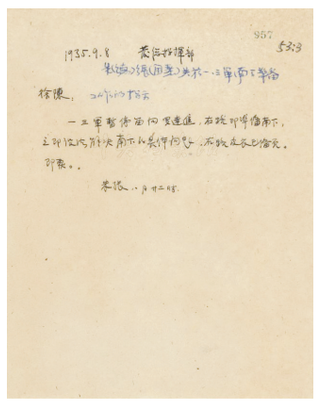
关键时刻的紧急抉择

——巴西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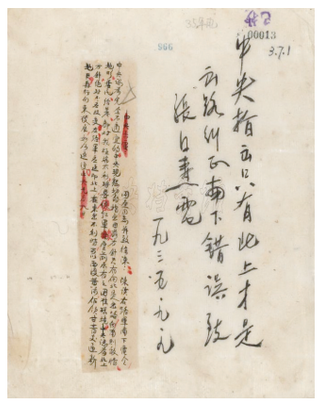
□ 高雪萍

档案中的党史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坚持南下。中央多次催促，劝说无果。1935年9月9日，中央紧急磋商，召开巴西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20多年后的1960年10月，当斯诺问及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时，毛泽东回答了“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一系列电文，如1935年9月8日《张国焘关于红一、三军停止北进、准备南下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令》《张国焘关于扣留军委纵队致詹才芳的电令》、9月9日《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再致张国焘电》等，留下了当时张国焘一意孤行执意南下和中央反复劝说、催促其北上的原始记录，为我们完整理解巴西会议提供了档案见证。



《张国焘关于红一、三军停止北进、准备南下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令》（中央档案馆藏）



《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再致张国焘电》（中央档案馆藏）

包座战斗胜利为北上创造有利条件

鉴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提出与中央决定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中央耐心规劝，反复督促张国焘北上。但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而一再贻误战机，使胡宗南得以在松潘集中兵力，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8月3日，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草地，经过约7昼夜行军，走出草地到达班佑。中央随右路军越过草地后，多次劝告、催促左路军北上。张国焘却拒不服从中央指示，坚持南下。8月29日，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越过草地后，向川西松潘包座地区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发动进攻。经过3天激战，歼灭敌军4800余人，缴获枪支1500多支。包座战斗打开了红军北上甘南的门户，为实现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包座战斗结束后，为催促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张国焘执意反对北上坚持南下

9月3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反对北上方针。电报称，噶曲河“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而事实并非如此，据徐向前回忆：“我们已令4军抽出1个团，预备粮食、马匹、牦牛，以便前往草地接应他们。”张国焘的这些理由均不能成立。

9月5日，张国焘命令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9月8日，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红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同日，电令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红三军周恩来住处召开会议，要求张国焘执行中央北上指示。9月8日22时，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电文强调：“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电报言辞恳切，字里行间感受到党中央挽救红军、维护团结的焦急心境。

然而，即便中央再三规劝，反复警示，9月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仍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坚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同日，中央再电张国焘，并致徐向前、陈昌浩：“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面对党中央晓以大义的苦口婆心，张国焘却始终置之不理，一意孤行。

党中央决定先行北上

9月9日，担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偶然发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写着“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察觉事态危急，叶剑英立刻报告了毛泽东。随后，召开了巴西会议。由于巴西会议是在危急时刻仓促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没有发现会议原始记录，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和相关电报佐证，目前较为一致的表述是：1935年9月9日晚，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红一军在原地待命。

9月10日凌晨，中央率红三军和红军大学离开巴西、阿西等地，向俄界进发。同时，叶剑英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带走军委纵队，同时拿走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当日，中央发布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3天之后召开的俄界会议，是巴西会议的继续和深入，在巴西会议的基础上，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公开的、系统的揭发和批判，提高了党员干部思想认识，确保了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

六届六中全会与党的干部路线的确立

□ 朱法娟

1938年9月29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开幕，直到11月6日才结束。此时，全民族抗战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正在扩展，党的组织任务随之加重。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一系列组织文件，把干部问题提到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因此成为党的干部路线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鲜明标志。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前后干部队伍面临的新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战争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广州、武汉相继失守，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苏南、皖南等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党的工作也随之从红军作战扩展到根据地建政、群众动员、统一战线和后勤保障。部队、政权和群众工作需要大批干部去支撑，原有干部的数量和经历都难以完全适应新的局面。

干部队伍的建设其实在全会以前就已引起中央注意。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同时给新党员以初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知识教育。决议还要求打破关门主义做法，把发展党员作为每个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经常工作。新成员来自不同地区和社会阶层，革命热情与组织经验并不相同。党员队伍和各地党组织发展起来以后，怎样教育新党员，怎样把积极分子培养成能够独立工作的干部，便成为各级党组织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

毛泽东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谈到，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列举党在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方面的骨干，同时提醒这些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全民族抗战初期的实践使这一判断更加具体：有的干部熟悉土地革命战争，却不一定熟悉统一战线工作；许多新参加革命的青年有热情，却缺少实际斗争经验。干部教育、选拔和使用，不能再停留于零散做法。党在过去十年斗争中损失了十几万干部。干部的损失和各地的实际需求，使培养新干部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与此同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党加强同党外各种人才的合作。如果只凭亲疏和个人好恶用人，便难以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怎样确定干部标准，怎样全面识别干部，怎样既严格管理又关心爱护干部，成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无法回避的问题。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在《论新阶段》中专设“干部政策”一节，毛泽东从党的17年斗争经验谈起，指出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党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并把干部培养同政治路线的实现联系起来，鲜明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论断，把干部工作从一般的人事安排提升为关系革命全局的组织工作。

全会所讲的才德兼备，有具体内容：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与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为私利。符合这些要求，就是“任人唯贤”；反之，以私人关系组织小派别，就是必须反对的“任人唯亲”。张闻天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中，也把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作为提拔干部的重要条件，并强调有计划地培养、帮助干部，发扬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还提出使组织工作中国化，要求把组织原则落实到中国的实际斗争之中。

围绕这些标准和原则，全会进一步明确了识别、使用和爱护干部的方法。识别干部，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使用干部，既要把任务交代下去，也要让干部敢于负责；爱护干部，则包括指导、提高、检查工作、帮助改正错误和照顾实际困难。党外有许多愿意抗日、各有所长的人才，同样应当关心和使用。毛泽东的报告由此把怎样识别、使用和爱护干部一一阐明，党外人才的关心和使用也列入其中。

全会政治决议案又把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一并列入培养提拔的范围，要求大量设立各级培养干部的学校、训练班。会议还进一步明确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并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干部标准、用人路线、识别方法、教育培养和纪律要求由此汇合起来，党的干部路线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得以形成。

干部工作不断走向系统化、制度化。全会以后，党的干部路线在各方面得到落实。首先是加强干部教育。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负责统一领导中央直属学校的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和教学方法，并领导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1940年1月和3月，中央又先后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干部学习的内容和制度作出安排。在这些指示中，中央要求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并保持经常性和持久性。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等干部学校也陆续培养和输送干部。1942年，中央政治局又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把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理论教育列为干部教育内容，并要求把学习情况作为干部鉴定标准之一。全会提出的学习要求由此转化为经常性的教育实践。

上述指示要求也体现在具体的人和事上。1939年，新党员刘力功在组织分配他到华北敌后工作时，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组织先后同他谈话七次，他仍拒绝执行决定，最终被开除党籍。刘力功事件被用来教育党员和干部：对一般错误要耐心帮助，对坚持错误而不接受教育者也不能放松要求。中央党务委员会把处理结果公布于全党，陈云随即写下《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要求党员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1940年，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进一步提出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强调考察干部主要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同时主张放手使用干部，并经常、适时地检查和帮助。

到了党的七大，全面、历史地评价干部的做法得到进一步体现。对于一些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干部，在选举时既不因一时一事抹杀全部历史，也不因既往贡献忽视现实表现。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计划为约500个县和1.6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准备5.3万名干部，要求各地有计划地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干部路线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展开，标志着党的干部工作由长期实践探索走向系统化、制度化，回答了革命事业怎样选人、用人、育人的根本问题，为坚持敌后抗战提供了组织保证，也为后来党的建设确立了影响深远的组织原则。

学史明理

被誉为『当代毕昇』的王选

□ 丛中笑

王选是新中国培养的计算机科学家，汉字信息处理与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他紧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时代脚步，带领团队勇攀高峰，攻克了用计算机处理汉字的世界难关，并大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引领中文出版印刷业实现了“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使古老的汉字迈入信息时代，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插上了科技赋能的翅膀，成为我国20世纪重大工程技术成就。王选被誉为“当代毕昇”，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20多项大奖，并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者”，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选择“冷门”计算数学，与国家前途命运相联。1937年2月，王选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记忆里父亲强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感，使他从小树立了爱国奉献的价值观，形成了正直善良、诚实宽厚的人生理念。

1954年，王选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名师的引导、严格的训练，使他具备了严密的思维推导和扎实的分析计算能力。1956年，王选遇到人生第一个重要抉择：选择专业。很多成绩好的同学选择了数学、力学专业，新兴方向计算数学却乏人问津。王选在图书馆浩瀚的资讯海洋里了解到，在我国刚刚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计算技术被列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技术任务。“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于社会”，在这一信念支持下，王选毅然选择了“冷门”的计算数学，满怀豪情地投身到我国早期计算机的研究中。他对自己的专业全情投入，经常加班加点。有天半夜，他去机房接班，迷迷糊糊穿错了室友的衣服，直到第二天中午去食堂买饭时才被大家发现。1958年王选大学毕业留校，参加了北大自行研制的中型计算机——红旗机的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他住进实验室，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最紧张的时候40个小时没合眼，被称为“拼命三郎”。过度的劳累使王选的免疫系统遭到损害，一病就是十几年。

勇于颠覆性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97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王选得知我国1974年8月设立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748工程”），立刻被其巨大的价值和难度深深吸引。众所周知，印刷术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然而西方已率先走上电子照排之路，我国却还在沿用落后的铅排印刷。“计算机时代是汉字的末日”“要想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必须走汉语拼音化的道路”的“预言”甚嚣尘上。王选预见到，如果研制成功能处理汉字的计算机照排系统，将是一场非凡的技术革命，决定立即进行研究。

王选拖着病体查阅外文资料，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结合国情仔细调研分析，最终作出大胆决策：跨过当时流行的二代机和三代机，直接研制世界上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王选充分发挥其数学基础研究特长，用“轮廓加参数”的巧妙方法，将数千兆庞大的汉字信息压缩约500—1000倍，存进只有几兆容量的国产计算机；又设计出超大规模专用芯片，使被压缩的汉字信息以710字/秒的速度高速复原，供激光扫描输出。王选发明的上述颠覆性技术，开创性地突破了汉字信息处理的数字化存储和输出等世界难关。

然而，当时的王选只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助教，由于技术过于超前，除了与他一起进行这项研究的夫人陈堃銶，几乎无人相信，有人甚至对他冷嘲热讽。但王选坚信自己的技术途径是正确的，国家有关部门和学校也给予了有力支持。王选带领团队克服重重难关，经过几十次试验，终于在1979年7月27日，输出了我国第一张汉字激光照排报纸样张《汉字信息处理》，1980年又排印出第一本样书《伍豪之剑》，1981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原理性样机通过了部级鉴定。

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走产学研结合之路。为实现“改变我国落后的铅排印刷面貌”的目标，王选提出了“顶天立地”的产学研结合之道：“顶天”即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即把技术商品化，并大量推广、应用。1985年，王选带领团队研制成功激光照排Ⅱ型系统，在新华社投入使用，并接连获得中国十大科技成就、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荣誉。然而，王选却有一种“负债心理”，因为当时国外厂商正大举进入，如果系统没有大规模推广，不但国家的投资得不到回报，市场也可能丢失，获再多奖也无济于事。于是，他和同事们不断创新，又研制成功了Ⅲ型、Ⅳ型系统，与《经济日报》合作，于1987年5月22日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张用计算机屏幕组版、用激光照排系统整版输出的中文日报。1988年，《经济日报》印刷厂卖掉了沉甸甸的铅字，成为我国第一家废除铅排作业的报社。

此后，王选率团队又先后研制出更为先进稳定、功能更强的中文电子出版系统，迅速占领市场。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90%以上的黑白书刊出版社和印刷厂都采用了国产激光照排系统，延续了上百年的中国传统出版印刷行业得到彻底改造，被公认为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

1993年，56岁的王选从科研一线退了下来，以提携后学为己任，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带领团队充满激情地冲锋陷阵，在应用激光照排系统“告别铅与火”后，又实现了“告别纸与笔”“告别报纸传真机”“告别电子分色机”“告别胶片”等一次次新闻出版领域的技术跨越，形成了全新的电子出版产业，最终成为我国用自主创新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典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王选最推崇一句格言：“献身科学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所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2006年2月13日，王选不幸离世，年仅69岁。2007年，一颗国际编号为4913的小行星，被命名为“王选星”，王选的名字连同他的精神一起，永远闪耀在宇宙星空，成为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生动写照。

改革先锋